

试析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

项佐涛

内容提要 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并没有一个核心的意识形态,其政策就是“取悦于民”。新民粹主义政党并不创设新议题,而只是“汇集民意”,迎合大众口味的各种主张都能为其所用。中东欧转型中存在诸多弊端如大众经济满意度差、阶级力量的溃散、传统政党代表能力下降、民族主义情绪发酵等因素,在社交媒体的重新整合下催生出新民粹主义。但是,新民粹主义所包含的彼此相互印证或相互矛盾的方案如经济平民主义、疑欧主义、反精英政治、民族主义等并不是解决中东欧现存问题的有效方案,反而加剧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本国与欧盟关系的紧张,推动中东欧政治朝着更为激进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世界政治 中东欧 新民粹主义 民主 政党政治

* 项佐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和社会主义思潮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AGJ001)

东欧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引入西方式民主制度。20多年来,绝大多数观察家认为,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实践是成功的、安全的,如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已经加入欧盟的国家,而在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等国,虽有缺陷、遗憾,但仍旧是进步的。^①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新民粹主义的兴起引起了一些观察家的警觉,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新民粹主义政党不甘心走传统中左、中右翼政党的老路。早在2004年6月,《经济学家》发表文章担忧新民粹主义力量的抬头,即在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地欧洲议会选举、欧盟吸收新成员国的投票中,选举结果显示出低投票率、反政府和反欧盟的特征。^②2006年,保加利亚召开了一场题为“新民粹主义的挑战”的学术研讨会。同年,世界银行发布公告称需要警惕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力量。^③近年来,随着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保加利亚的欧洲发展公民党、罗马尼亚的民主自由党^④上台,以及其他一些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上升,中东欧政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⑤相较于西欧和美国,中东欧国家的一些新民粹主义政党已经上台执政并且完成了一个或多个选举周期的更迭,从而为观察新民粹主义提供了更为完整的案例。

一、中东欧新民粹主义的兴起

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以政党为主要载体。这些政党主要有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自卫党、波兰家庭联盟,匈牙利的青民盟、尤比克党、民主论坛,斯洛伐克的方向——社会民主党、民斯运、公民谅解党、斯洛伐克民族党,保加利亚的稳定与振兴国民运动、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欧洲发展公民党、“阿塔卡”联盟,罗马尼亚的民主自由党、大罗马尼亚党,捷克的“阿诺”运动,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斯拉夫尼亚和巴拉尼亚民主联盟,等等。这些政党的产生、党员的组成和

① Mihai Varga and Annette Freyberg-Inan, “The Threat of Selective Democracy: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and Exclusionary Strategy of Elites in East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Southeastern Europe*, Vol.36, No.3, 2012, pp. 349-372.

② “Populists, Ahoy; Central Europe’s Elections,” *Economist*, June 19, 2004, pp. 50-51.

③ “World Bank EU8 Quarterly Economic Report,” September 2006, pp. 6-8,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CA/Resources/EU8QERSeptember2006_MainReportFINAL.pdf, 2016-07-30.

④ 在2014年与国家自由党合并为国家自由党。

⑤ 项佐涛:《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国际政治研究》2010年第4期。

动员方式都呈现出新特点,而通过这些政党的理论主张和关注的议题,可以看出新民粹主义不同以往民粹主义的一些新内容。

(一) 中东欧新民粹主义为何是新的?

新民粹主义是针对 19 世纪的俄国民粹派^①的理论而言的。民粹主义无论新旧均有三个核心概念,即人民、精英与领袖。

人民的同意被民粹主义标榜为其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人民则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同质群体。然而,人民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模糊的概念。人民有时指的是所有人,有时指的是部分人。当指所有人时,人民往往被当作一个抽象的概念来对待,比如说拥有主权的人民;当指部分人时,某些人会被从人民的圈子中划出去如被作为阶级专政对象的反动派。此外,人民可以是崇高的,以“人民的名义”会成为一切合法性的依据;人民也可以是低贱的,与暴民、乌合之众联系在一起。因此,理性的民主主义者在为民主高呼时,会担心出现暴民政治的危险;独裁者在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时,却把人民踩在脚下。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民粹主义语境中的“人民”的范围常常是经常变动的。

与人民相对的是精英。精英的概念最初由精英主义理论家引进政治学。在精英主义的思路中,社会是由精英和普通大众两部分组成。例如,意大利政治学家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认为,任何社会都必然存在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统治阶级就是由具有杰出才能和统治能力的精英组成。^②精英主义者对精英的理解和民粹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精英主义着重于说明精英统治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而民粹主义则关注精英是如何的自私自利与道德败坏。正如英国政治学家卡农范(Margaret Canovan)所言,民粹主义首先是对于精英掌握权力和主流政治话语的一个回应,是“‘人民’反对既有权力结构、统治思想和社会价值的诉求”。^③在民粹主义语境下,精英总是在道德上处于劣势的群体,是人民的对立面,是“一个排他性的麻木不仁的和不负责任

^① 关于俄国民粹主义可参见马龙闪:《俄国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的主要特征》,《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参见〔意〕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③ Margaret Canovan, "Trust the People! 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47, No.1, 1999, p. 3.

的卡特尔,一个由懒惰成性、毫无能力、自私自利、权力驱使的恶棍组成的阶级”。^①在此基础上,民粹主义政党自诩为“纯洁”政治的维护者,它们能够革新“被扭曲的”精英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民粹主义政党公开宣称要将权力还给人民,政治就是直接民意的表达,即直接民主。^②

除了人民和精英之外,领袖对于民粹主义也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反精英的运动,民粹主义鼓吹人民的统治,却又试图建立一个由强大领袖领导和剥夺人民权利的、排他性的新精英的统治。“民粹主义政党及领袖看似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无能的腐败的精英,实则想成为新的精英并巩固他们的地位。”^③实际上,民粹主义缺乏实质和核心的价值观的特点极容易导致领袖的专断。^④在民粹主义运动中,人民是行动的主体。但是,人民通常是一群组织松散、没有充足的政治活动经验的群体。置身于群体之中的缺乏政治经验的人民会表现出非理性的群氓现象,从而极易导致超凡魅力型领袖的产生。从人民的角度看,他们在领袖身上找到自身所缺乏的人格品质,从而产生了对领袖的无条件的支持;从领袖角度看,他们往往将自身的认同感与具有“天赋使命”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并从这个事业中获得权力和荣耀。^⑤领袖的权威一旦确立,追随者便倾向于无原则地支持领袖,领袖也总是倾向于运用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来激发追随者的忠诚,使之献身于运动。随之,领袖的个性和意志便会取代传统的制度和规则,领袖成了运动的中心,成了所有追随者的联系纽带,成为运动的指路人。正因如此,民粹主义者倾向于反建制,而喜欢运用政治动员的活动方式。

概括起来,民粹主义的基本逻辑就是:人民对精英的普遍不满是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而个性突出的政治领袖则通过非黑即白的话语,引爆了人民心中的不满,指引人民起来行动。何为人民、谁是精英和何种话语则共同塑造着民粹主义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从而决定了新旧民粹主义的区别。

虽然存在上述共性特征,新民粹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的差异依然是明显

① Andreas Schedler, “Anti-Political-Establishment Parties,” *Party politics*, Vol. 2, No. 3, 1996, p. 291.

② Petr Kaniok, Vlastimil Havlik, “Populism and Euroscepticism in the Czech Republic: Meeting Friends or Passing By?”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Vol.16, No.2, 2016, p. 21.

③ Attila Ágh, “Decline of Democracy and Increasing Populism in East-Central Europe: Populist Democracy as Electoral Autocracy in Hungary,” ECPR Joint Sessions, Pisa, 24-28 April 2016, p. 7.

④ [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⑤ 同上。

的。俄国民粹主义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在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中,知识分子发挥了绝对的主导作用,从理论探讨到现实操作都是由少数知识分子一手推动的,底层民众并没有太多参与。第二,俄国民粹主义存在着明确的动员对象——农民。虽然俄国的农民也如同马克思形容法国的农民那样是“一袋马铃薯”,^①但是他们仍旧构成了一个阶级,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第三,俄国民粹主义明确提出反对资本主义,是一群知识分子为寻找俄国的发展道路而提出的主张。与之相对,新民粹主义并不公开反对资本主义,却充分利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②同时,新民粹主义还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1. 新民粹主义政党意识形态比较模糊。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界线,人们很难用传统的“左”和“右”来理解其理念和行为。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是模糊的,它们可以兼容其他信仰体系,迎合大众口味的极左、左、中左、中右、右、极右的政策都能为其所用。有学者称其在意识形态上是“空心”的,^③也有学者称其是一种“中心思想薄弱”的意识形态。^④在行动上,它们可以随意地与其他类型政党结成联盟,甚至它们本身就是多种类型政党的糅合和变异。对此,有学者认为:“在民粹主义时代,阵线不再位于左和右、改革者和保守者之间。在更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日益怀疑民主的精英和日益怀疑自由的愤怒的公众之间的对立。”^⑤因此,新民粹主义政党只是“汇集民意”和“引导民意”,与人民的观点互相“理解”、相互印证和彼此强化。在新民粹主义的语境下,“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竞选和煽动,对话和诱惑之间的界限很难分清”。^⑥新民粹主义政党不追求纲领的逻辑和立场的一致性,而是着眼于突出纲领中某个部分能够有针对性地吸引某些民众。人民也不去计较新民粹主义政党整个纲领的代表性和一致性,而只是看其中让自己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

② Takis S. Pappas, “New and Old Populism in Eastern Europe”, http://www.bridge-mag.com/magazin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60&Itemid=42, 2016-10-06.

③ Paul Taggart, *Populism*,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22.

④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xclusionary vs. Inclusionary Populism: Comparing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48, No.2, 2013, p. 153.

⑤ Ivan Krastev, “The Populist Moment,”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09-18-krastev-en.html>, 2016-09-18.

⑥ Ralf Dahrendorf, “Acht Anmerkung zum Populismus,” *Transit*, Vol.25, 2003, pp. 156-163.

满意的部分。因此,可以经常发现,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会飘忽不定,而且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

2. 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员对象并不是某个特定阶级。支持新民粹主义的人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类似于阶级的具有共同身份特征和意识的群体。甚至通常情况下,恰恰是因为之前的阶级、等级等固有身份被打破,单个的人民才被解放出来,成为重新寻求集体安全感的原子化的人,可以被新民粹主义动员的人。原子化的人常源于危机意识如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者的不满或者对异质宗教或文明的排斥而聚合在一起,但是并不会像阶级行动那样受到明确的阶级意识的指引,而是纯粹的自发行为。他们只是区分“谁是人民”和“谁不是人民”,却没有“怎么办”的一致答案。这恰恰为民粹主义的动员留下了充足的空间。为了选票,新民粹主义政党随意扩大动员对象。新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主要以中低收入者为主,^①因为中下阶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下降,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产阶级贫困化、下层群体增加的趋势导致了中下层对于原有统治精英的不满。^②然而,中低收入者只是一个收入水平近似的群体,而不是一个具有统一阶级意识的阶级。在新民粹主义政党把他们动员起来之前,这些人可能是政治沉默者,可能是左翼的支持者,可能是右翼的支持者,还可能是根据自己的感觉用“脚”投票的人。此外,新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中也不乏一些高收入者。实际上,人们支持新民粹主义的动机并不相同,有人出于经济角度,有人出于政治角度,有人出于民族、种族、文化和宗教的角度。他们聚集在新民粹主义的大旗下,只因为它庞杂的纲领中能够容纳下他们的一些被传统主流政党视为不合理、不正确的主张。

3. 以社交媒体为主的动员模式。“社交媒体的发展造就了向个人、组织或是某种观念表示忠诚的新渠道”,^③从而为新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便利的动员平台。在社交媒体上,虚拟的政治活动和现实的政治活动混合在一起,个人简单地点一下鼠标就可以表达政见,参与政治活动。这是21世纪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与政治联系的新方式,并且正在成为新常态。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可以

^① Jürgen Habermas, “For a Democratic Polarisation: How To Pull The Ground From Under Right-wing Populism,” <https://www.socialeurope.eu/2016/11/democratic-polarisation-pull-ground-right-wing-populism/#>, 2017-01-08.

^② 据统计,2009年德国40%的就业者月纯收入在1000—2000欧元之间,约30%的就业者收入更低,只有5%的就业者收入在5000欧元以上。

^③ Jamie Bartlett, et al., *The New Face of Digital Populism*, London: Demos, 2011, p. 33.

突破许多过去的禁忌,自由地表达非理性的、不负责任的和极端的想法,很快找到“志同道合者”,迅速形成“认同集团”,并且从中获得信念的支持。新民粹主义看到了社交媒体的上述特点,“刻意在社交媒体如推特、脸书等发展正式党员,寻求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和同情者。”^①正是利用社交媒体,新民粹主义政党成功打破了传统媒介对“政治不正确”议题的封锁,将其庞杂的、极端的议题快速地传递给分散于各地的原子化的人,将原子化的个人和“认同集团”整合到自己的旗下。

(二) 中东欧民粹主义政党的基本主张

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基本主张体现了新民粹主义的共性特征。^②在意识形态上,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政党是“空心”的。在竞选过程中,它们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而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环保主义等不同意识形态的政策都可揽入囊中,唯一的取舍标准是它们是否有助于动员民众。例如,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高举天主教保守主义、欧洲怀疑主义、民族保守主义等右翼价值观,经济上奉行的却是类似于左翼的民族经济保护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阿塔卡”联盟在民族和宗教层面极端保守,在经济政策上则提倡可以视为左翼的“社会民族经济”。^③“阿诺运动”直接将自己定位为跨越“左”“右”的“企业化政党”,“反对”和“企业化”成为它的代表性口号。“反对”即反政党、反腐败和反政治;“企业化”即将治党和治国比作企业的运作。“阿诺运动”的主席巴比什(Andrej Babiš)明确指出:“我不是政治家,将来也不会是政治家……我是一个经理人。在议会和政府中理应存在经理人……捷克就是一家拥有千万股东的公司,由于管理者

^① Jamie Bartlett, et al., *The New Face of Digital Populism*, London: Demos, 2011, p. 15.

^② 尽管有学者尝试区分西欧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的不同,但并不成功。例如,塔拉努(Andrei Țăranu)认为,中东欧新民粹主义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色彩更浓厚,而西欧新民粹主义“由于政治正确的缘故,排外主义的叙述主要是基于经济话语(移民偷走了我们的工作岗位)或是社会角度(他们不愿意被同化)”。同时,西欧新民粹主义话语中的“他者”通常被描述为一种外在的威胁国家同质性的结构,如移民和寻求政治经济庇护者;中东欧新民粹主义辞藻中的“他者”往往存在于社会内部,如罗姆人、犹太人或其他少数民族。参见 Andrei Țăranu, “Populism as the ‘Democratic Malaise’,” *Europe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Vol.8, Supplement 1, 2012, p. 134. 塔拉努完全忽视了新民粹主义变动性和相互效仿的能力,如今,东西欧新民粹主义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内容的差异,只是程度的轻重。

^③ Andrea L. P. Pirro,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Different Context and Issues of the Prophets of the Patria,”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49, No.4, 2014, p. 615.

的失职和管理高层的窃取,公司目前处于负债运营的状态。”^①

在具体政策上,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共同着力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赞成市场经济,但主张重新分配转型以来的社会财富。新民粹主义政党承认剧变后引入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把繁荣本国的市场纳入竞选纲领之中。然而,它们认为,市场经济下的转型成果分配是不公正的,真正获利者是精英,精英的贪婪、自私造成人民的普遍贫困,因而,需要在精英和人民之间重新分配财产。^②为此,新民粹主义政党提出了一系列的财富再分配计划。

第一,提高外资占比较多的行业税负。例如,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在2016年决定对外资持股较多的银行业和零售业提高税收;^③青民盟政府设立“危机税”,以公司总营业额、(银行)资产总额、(保险公司)总保额等为基础征税,由于匈牙利大量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被外国资本收购,外资控股的公司几乎都被新税种涵盖。后来,“危机税”变为了永久税。

第二,在能源、资源、银行等外资占比较重的行业推行国有化。例如,2014年,匈牙利政府收购了通用资本布达佩斯银行和巴伐利亚银行控制的匈牙利外贸银行。到2014年底,匈牙利政府已经控制了银行体系的50%。同时,匈牙利政府以18.8亿欧元的价格从俄罗斯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收购了匈牙利油气集团21%的股权,匈牙利油气集团收购了意大利能源巨头埃尼公司麾下的匈牙利分公司。

第三,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例如,波兰政府降低了家庭津贴的收入门槛,一般家庭申请津贴的人均收入上限由之前的574兹罗提提高到了674兹罗提,残障儿童的家庭从664兹罗提提高到了764兹罗提;实施“家庭500+”计划,原来的儿童津贴方案是每个0—5岁的儿童每月领取77波兰兹罗提,5—18岁的儿童每月领取106波兰兹罗提,实施“家庭500+”后,每个儿童每个月将领取到500波兰兹罗提的补贴;改革养老退休机制,退休金的多少将取决于退休前的收入,退休前月收入越高,退休金就越少。

^① Lubomír Kopeček, “I’m Paying, So I Decide: Czech ANO as an Extreme Form of a Business-Firm Part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 June 2, 2016, p. 1.

^② Grigorij Mesežnikov, et al., eds., *Populist Politics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 Bratislava, 2008, p. 10.

^③ 在2016年波兰财政部公布的税收清单中,从企业税中专门新增一项“外资控制企业收入税收”(tax from revenues of foreign controlled companies), <http://www.mf.gov.pl/en/ministry-of-finance/state-budget/revenue-expenditure-deficit-execution/2015,2016-06-01>。

2. 反对传统精英,反对建制。新民粹主义政党不反对民主主义,却反对自由主义。^① 政治自由主义强调容忍不同观点和不同的政治选择。与之相对,新民粹主义政党鼓吹人民意志至上,任何与人民意志不同的诉求和力量都不能被宽容,传统精英被置于人民的对立面。而在中东欧新民粹主义的语境中,社会的最顶层和最底层都不属于人民。最上层的精英不劳而获,最底层的移民或少数族裔坐享其成,而且上层精英总是过分照顾那些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不属于人民的人,例如,以权利保护为名在少数族裔者身上滥用社会福利。鉴于此,新民粹主义政党指责传统精英没有资格充当“人民”的代表,呼唤更多民众参与选举,选出道德上更纯粹的人来代言。为了动员更多的民众,新民粹主义政党刻意选择一些敏感的话题来迎合对传统精英不满的人的诉求,尤其是在腐败、跨界民族及道德等问题上。

矛盾的是,以反精英面貌出现的新民粹主义政党却试图建立另一种由魅力领袖领导的、排他性的精英统治,因为只有新民粹主义政党才被宣传成为人民意志的唯一代表。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政党无一例外地进行魅力领袖的塑造运动,如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有其魅力领袖鲍利索夫(Boyko Borsov)、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有卡钦斯基(Jaroslav Kaczynski)、罗马尼亚民主自由党有伯塞斯库(Traian Basescu)等等。在实践方面,各党极力塑造领袖的平民、反腐和非官僚形象。例如,鲍利索夫担任过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的保镖,欧洲公民发展党借此渲染鲍利索夫神秘英雄的形象。史泰龙(Michael S. G. Stallone)主演的电影《眼镜蛇》在保加利亚上映后,一些媒体便报道说鲍利索夫就是电影中打击坏人和腐败的英雄警探。对此,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政党及领袖看似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无能的腐败的精英,实则想成为新的精英并巩固他们的地位。因此,中欧的民粹主义有一种渴望成为新精英的欲求。”^②

不仅如此,上台后的新民粹主义政党还试图消除传统政治框架的束缚。例如,法律与公正党在2015年上台后推动议会通过了《宪法法院法》修正案,旨在削弱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能力,为政府施政扫除司法障碍。《宪法法院

^① Grigorij Mesežnikov, et al., eds., *Populist Politics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p. 8.

^② Attila Ágh, “Decline of Democracy and Increasing Populism in East-Central Europe: Populist Democracy as Electoral Autocracy in Hungary,” p. 7.

法》修正案的核心内容是提高法定的裁判合议庭出席人数,由之前的9人升至13人,裁判生效的投票数也由简单多数改为2/3多数。简单说,若宪法法院之前裁定公权违宪,需15位宪法法院法官中的9位法官出席且5人投票赞同,如今需要至少有13位法官出席且需有2/3的法官投赞同票。与法律与公正党相比,青民盟毫不逊色,除利用议会多数席位的优势修改宪法、干预司法外,青民盟还利用“非我即彼”的话语明确了阵营的分界线,并通过改变选举体制增加主要反对党社会党的参选难度,稀释反对党的选票,压制反对党的活动空间。因此,柏林自由大学的瓦尔加(Mihai Varga)尖锐地批评说:“迄今为止,作为一个排他性政党,青民盟通过破坏法治,在它创设的选择性民主的道路上走得最远。通过对下列机构(宪法法院等——笔者)的破坏,青民盟确保按照自身的利益工作(而不是为了任何大众利益)。”^①

3. 鼓吹民族主义和欧洲怀疑主义。在中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具有肥沃的土壤。但是,民族主义政党并不都是新民粹主义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的主要目标是民族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民族问题具有毫不妥协性,执政只是手段。新民粹主义政党也不都是民族主义政党,但由于它们的唯一目的是上台执政,民族问题只要对自己的选举有利,就会成为新民粹主义政党的重要议题,甚至有时候它们会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民族主义政党。装扮成民族主义的新民粹主义政党具有超强的社会根基,利用民族主义排外取向,把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内化为民族整体的价值利益,强化底层民众的民族认同,通过选民动员和政治宣传有效引导群体心理取向,把草根性的政治参与转换成政党自身的社会基础。

新民粹主义政党鼓吹民族主义的第一个表现形式是欧洲怀疑主义。随着民众对欧盟失望情绪的蔓延,“欧盟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问题”。^② 欧洲怀疑主义已经成为影响中东欧政党的纲领设计与政府治理的一种工具,也成为政党政治和政党政府中一个新的关注点。具体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挑战欧盟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公正的价值观。例如,匈牙利青民盟上台后,利用自己对议

^① Mihai Varga and Annette Freyberg-Inan, “The Threat of Selective Democracy: Popular Dissatisfaction and Exclusionary Strategy of Elites in East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pp. 349-372.

^② Janis Emmanouilidis, “A Quantum Leap in Economic Governance: but Questions Remain,” *EPC Post-Summit Analysis*, Mar. 28, 2011, p. 13, http://www.epc.eu/documents/uploads/pub_1247_post-summit_analysis_-_28_march_2011.pdf, 2017-01-06.

会多数席位的控制,在没有反对党参与的情况下,提出新的宪法草案并使之通过。新宪法为人诟病的主要方面有:将国名“匈牙利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去掉“共和国”的字样;将基督教作为匈牙利历史和文明的基础,而无视其他宗教的贡献和地位;限制宪法法院的权力,规定在审查中央预算及其执行、中央税种、关税等法律是否符合宪法时,宪法法院只能就其是否损害人的基本权利方面进行审查;扩大政府和总理的权力;推崇保守主义价值观,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①另外,对欧盟持矛盾心态。新民粹主义政党既是本国融入欧洲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也是担心本国沦为欧洲发达国家附庸的拥趸者。例如,捷克公民民主党虽然对本国加入欧盟、融入欧洲表现出极大热情,但由于部分民众在国家主权和民族身份问题上对“欧洲化”存有疑虑和担忧,为获得这部分民众支持,公民民主党转而要求把“欧洲化”进程限定在社会经济领域,反对在其他社会领域尤其是国家主权和民族身份问题上过度“欧洲化”。^②

新民粹主义政党鼓吹民族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宣扬大民族主义和对少数民族报以不宽容的态度。^③例如,匈牙利青民盟将国名由“匈牙利共和国”改名为“匈牙利”后,赋予其他国家的匈族人在匈牙利大选中的投票权,让中东欧国家本已平复的匈族人问题再次被挑起,匈牙利与相关国家关系也因而紧张。再如,尤比克党将匈牙利的“吉卜赛人问题”等同于“吉卜赛人犯罪问题”,主张对吉卜赛人采取强制性同化政策;“阿塔卡”联盟宣扬保加利亚是单一民族国家,针对罗姆人和穆斯林少数民族主张采取强制性的同化政策;斯洛伐克民族党不仅对本国罗姆人持敌视态度,还经常质疑斯洛伐克匈族联盟的合法性和匈族少数民族存在的必要性,主张在更广义上同化它们,等等。^④

4. 重视利用新媒体和控制媒介。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领袖们热衷于在脸书、推特、网络日志、维基百科等社交媒体表达政见、组织动员。上台后,新民粹主义政党则尽其所能地去操控媒介,压制批评的声音。例如,匈牙利青民盟推动通过了《大众媒体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政府将成立一个由多位执

① 黄立菲:《“未完成的革命”:匈牙利学者对1989年剧变等问题的再认识》,《俄罗斯信息研究》2011年第6期。

② 朱晓中:《中东欧转型2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③ Lenka Bustikova and Herbert Kitschelt, “The Radical Right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egacies and Party Competi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Vol.42, No.4, 2009, p. 459.

④ Andrea L. P. Pirro,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Different Context and Issues of the Prophets of the Patria,” pp. 616-617.

政党成员组成的“全国媒体及通讯委员会”，负责管理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新闻报道。“全国媒体及通讯委员会”将监督新闻报道是否“平衡”及尊重“人的尊严”、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对于违反规定的新闻机构将处以重罚。波兰总统杜达(Andrzej Duda)在2016年新年前夕签署的《媒体法》规定，公共电视和广播的高层须得到政府任命，绝大多数的公共媒体职员需要重新申请他们的工作岗位。在新媒体法颁布后，波兰国家电视台TVP基本上被法律与公正党所掌控。^①

除上述共同之处，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的主张也存有差异。实际上，新民粹主义政党间常常开展比谁更激进的竞争。据此，有学者根据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政党“极端”的程度不同，将它们分为“温和”的和“强硬”的新民粹主义。前者虽然批评现有的代议制和政党体制，但并不反对宪法框架。它们的兴起主要源于代表制度的危机。部分选民不再信任原有的政党，认为它们代表的是精英而不是普通民众的利益。此类政党主要有青民盟、社会民主-方向党、西美昂二世运动、欧洲发展公民党。后者不仅反对现有的代表制，更反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保护少数人的原则等。此类政党主要有法律与公正党、自卫党、家庭联盟、“阿塔卡”联盟、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人民党和民族党等。^②“温和”与“强硬”的区分对于理解新民粹主义的确有帮助，因为新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的分歧经常发生。不过，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分歧更多的是激进程度不同，而非议题方向不同。同时，由于其“空心”的意识形态特征，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处于变动之中，不仅台上、台下不同，甚至为了选举需要它们也相互学习，“温和”和“强硬”的界限不仅时常变动，而且也越来越不明显。

新民粹主义政党的“标新立异的无原则”让它们获得了空前成功。在波兰2005年的议会大选中，法律与公正党以27%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获得组阁权，如今这个政党不仅是议会第一大党、执政党，还是总统的推举者。在匈牙利，青民盟在2006年的议会大选中获得386个议席中的164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在2010年的议会选举中，青民盟和基民党竞选联盟赢得206席获得

^① Jan Cienski, “Polish Media Veers back to Pre-1989,” <http://www.politico.eu/article/polish-tv-viewers-turn-off-tune-out-drop-out-poland-kaczynski/>, 2016-07-14.

^② Grigorij Mesežnikov, et al., *Populist Politics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 9.

组阁权；在 2014 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青民盟获得 110 席，远远高于其他政党。在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长期占据议会第一大党的位置，民主斯洛伐克运动—人民党在 2006 年大选中获得 8.79% 的选票，成为执政联盟中的一员；2011 年成立的普通人与独立人格党则在 2012 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8.55% 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在罗马尼亚，民主自由党在 2008 年的议会大选中获得 115 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上台执政；在 2016 年的议会选举后仍是最大的反对党。在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在 2009 年 7 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在 2014 年议会选举中仍旧得票率最高。

二、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政党兴起原因

新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国家兴起的原因非常复杂。有学者试图从共产主义的遗产角度进行解读。^① 然而，整个欧洲和美国的新民粹主义势力的抬升证明中东欧国家出现新民粹主义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基因”不好，而是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可供新民粹主义兴起的“土壤”。新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国家能够上台，原因只是这些国家的某些特性使得新民粹主义生长的“土壤”更肥沃。概括来说，中东欧国家的新民粹主义是这些国家的部分政客和民众对全球化、欧洲一体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发展不尽人意、民族主义情绪发酵、阶级力量的溃散、传统政党代表能力的下降等一系列负面问题的一种回应。新民粹主义在其他精英看来是非理性的、非道德的和哗众取宠的，在社交媒体帮助下却能够快速实现政治动员和社会力量的整合。

（一）普通民众对经济现状不满

中东欧国家进入全球市场与融入欧洲统一市场是同步的，与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也是同步的。由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模式被认为是经济衰落的根源，全球尤其是西欧的资本和商品对中东欧国家旧有经济结构的冲击被看作是必要的、有益的，期间产生的剧痛也被当作是在为过去“还债”，绝大部分民众相信转型结束一切都会好起来。在 2000 年前，中东欧国家的确实现了

^① Andrej Skolkay, "Thinking Fundamentals," Vienna: IWM Junior Visiting Fellows Conferences, Vol.9, 2000, pp. 4-5.

经济的巨大变革: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所有制领域基本完成了私有化改造,20世纪90年代中期,私人资本在东欧各国逐渐占到社会总资产的50%—70%;^①告别了短缺经济,商品较过去极大丰富,等等。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东欧国家位于转型成功程度上等和中上等的国家行列。^②进入2000年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代价下降,收益扩大,中东欧国家进入了享受改革成果的时期”。^③持续的经济增长缩小了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2004—2008年,中东欧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6%,是欧盟老成员国的近3倍。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在不断上升,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1992—2007年,中东欧国家人均收入占15个老成员国人均收入的比重从37%增加到52%。^④

然而,经济转型结束尤其是部分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民众的不满却逐渐增加,因为中东欧国家的民众所期待的德国式生活水平并没有随之而来。中东欧国家与欧盟老成员国的差距依旧难以弥合,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及民众预期。作为衡量民众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中东欧八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老牌的欧盟15国仍然差距很大,没有突破2万美元大关,而欧盟1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部分都在3万美元以上。2006年,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同世界银行联合举行的“转型中的生活调查”显示,中欧国家18—34岁的人群中超过50%的人认为,经济形势要好于1989年,而在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群中只有35%的人对此表示认同。中欧国家对生活满意的年轻人占65%,而东南欧年轻人对生活满意的只有40%多。2008年以后,许多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2008年—2010年,中东欧国家有38%的家庭经济情况恶化,其中家庭工资下降29.3%,19.8%的家庭有成员失业,13.1%的家庭工资被拖欠或停发。因此,2011年进行的第二次“转型中的生活调查”显示,民众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并没有明显改善,在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

① Maria Lado,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the Candidate Countries,” Europ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Observatory On-line, www.eiro.eurofound.ie, 2016-07-03.

② Martha de Melo, et al., “Patterns of Transition from Plan to Market,”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10, No.3, 1996, pp. 403-404.

③ 孔田平:《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与挑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2期。

④ Alexandre Vincent, “CEECs: Convergence Tested by the Crisis,” *Conjoncture*, No.1, 2010, p. 25.

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还出现了下降。^①

在此背景下,转型中产生的许多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并且被认为是需要重新评价的。

第一,贫富分化问题。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虽然产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但社会贫富二元对立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富人是官僚,现在是新权贵。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到2000年初,中东欧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7—0.37之间,而转型之前在0.19—0.24之间。2007年,在社会转型后陷入贫困风险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保加利亚为14%,捷克为10%,匈牙利为16%,波兰为19%,罗马尼亚为19%,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均为12%。^②同时,由于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被完全抛弃,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许多人抱怨现在的生活状况比剧变前并没有多少改善,甚至变得更糟。

第二,经济犯罪问题。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犯罪。根据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波兰公司腐败程度比西欧国家高出一倍,每五家公司中就有一家存在腐败问题,有12%的波兰公司声称由于竞争对手行贿导致其失去合作伙伴;在捷克、匈牙利等国比例高达17%。^③过去,经济犯罪问题被认为是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现在,经济犯罪被定性为盗窃了转型的成果,对转型时期暴富的企业和政客需要重新审查。

第三,外国资本问题。中东欧国家为加入欧盟,主动向欧盟国家开放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开放的过程中,中东欧国家实现了全面私有化。大量国外资本尤其是老成员国的资本流入,或者直接出资并购,或者扶植代理人购买原来的国有资产。可以说,中东欧国家开放的过程就是跨国公司所有权的获得与本土所有权丧失的动态失衡过程。跨国公司不仅获得所有权,而且还从中东欧国家手中拿走了从固定资产中收取租金的权利,消灭了中东欧国家的

^①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 (LITS) 2006 A Brief Report on Observations, Experiences and Methodology from the Survey,” <http://www.ebrd.com/cs/Satellite?c=Content&cid=1395237699753&d=&pagename=EBRD%2FContent%2FDownloadDocument>, 2017-01-08;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 II,” <http://www.ebrd.com/cs/Satellite?c=Content&cid=1395237690999&pagename=EBRD%2FContent%2FDownloadDocument>, 2017-01-08.

^② 转引自孔田平:《中东欧经济转型的成就与挑战》。

^③ 《波兰公司腐败程度比西欧国家高出一倍》, <http://pl.mofcom.gov.cn>, 2016-07-05。

民族品牌。”^①而中东欧经济体一旦被改造成了外国人控制着大部分资本时，“这些国家不仅仅是丧失了对本国资源的控制权，它们还不得不交出自己相当大一部分的政治权力”。^②因此，当外国资本问题被提出来时，它就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外国资本被认为是经济转型的积极的助推器，如今，外国资本被当作是本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和本国财富的掠夺者、人民的对立面。

（二）民族主义的泛滥

与西欧大国相比，中东欧国家是小国或者弱国。它们在历史上曾饱受东西方大国的欺凌，领土常常被大国作为政治斗争的筹码交易，甚至中东欧国家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准生证”也是由大国签发的。这种历史记忆不仅导致了中东欧国家对主权的珍视，也导致它们对东西方大国的不信任。剧变后，中东欧国家终于从苏联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国家的自主性前所未有。然而，对于中东欧国家来说，加入欧盟同样是一种非东即西的选择。小国永远需要大国，尽管加入欧盟是它们心甘情愿的，但是，欧盟会不会成为另一个苏联？历史上受西欧大国欺凌的悲剧会不会重演？中东欧国家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少。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主权让渡就成为一根刺痛着中东欧国家敏感神经的骨刺。从欧盟的发展来说，民族国家主权的让渡是欧洲实现一体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也是必要条件。其主要表现就是欧盟成员国在经济、安全、外交、司法、民政等方面的主权让渡给欧盟，但是，对中东欧国家来说，主权让渡会不会使自己丧失在欧盟中的发言权？如何维护自己在欧盟中的平等地位？实际上，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主要机构中的确分到的都是闲差。而对激进的民族主义政党来说，主权更是不可分割的，让渡主权意味着国家灭亡。因此，伴随着对主权让渡涌现出了怀疑欧盟的声音。

加入欧盟前，中东欧国家的民众认为入盟后很快就会获得西欧民众那样的富足生活，因而，尽管欧盟的要求并不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但为尽快加入欧盟，绝大多数选民倾向于把选票投给“亲欧”的政党。加入欧盟后，很多民众

^① 薛莉：《一体化进程中经济的失衡与失序：对中东欧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

^② 〔美〕卡齐米耶日·Z. 波兹南斯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佟宪国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越来越敢于说出自己对欧盟的不满,表达自己利益诉求与欧盟的不同。据调查,中东欧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的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度自2004年入盟以来总体呈下降趋势。2004年11月,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对欧盟的信任程度分别是50%、64%、52%、60%,2013年11月下降到了45%、47%、35%、47%。^① 民众对欧盟失望情绪的蔓延为持欧洲怀疑主义的新民粹主义政党准备了群众基础。

(三) 传统阶级力量的溃散和传统政党代表性的减弱

转型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政党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社会主义时期,中东欧国家的阶级构成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随着社会转型,中东欧国家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主要体现为:第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虽然仍是社会的主体阶级,但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第二,以知识分子和第三产业从业者为主体的新中间阶层人数增加;第三,资本家阶级人数也大量增加,虽然并不如同西欧那样多。在此背景下,转型初期形成的中左、中右政党平分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很大变化。中左翼、中右翼政党都不同程度地调整了自己的阶级定位。中左翼政党采取多种措施吸引中间阶层的支持,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影响,它们倾向于在表明自己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同时,更强调自己的全民党特征。中右翼政党也并不像西欧传统中右翼政党那样强调自己的“干部党”“精英党”的特征,因为中间阶层以及庞大的产业工人、农民等中下层阶级也是它们选票的重要来源。在选举中,它们更倾向于突出自己与中左翼政党在转型政策上的不同,而不是阶级身份的差异。

身份定位和阶级基础的变化,导致了中左翼、中右翼政党的政策主张的接近。剧变初期,中左翼、中右翼政党主张的不同之处在于如何处置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和实现西欧式福利国家的方式上。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在转型的宏观内容上难以绕开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控制,但中左翼、中右翼政党在转型方式上主张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中左翼政党一般主张渐进转轨,强调转型不能以牺牲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或者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对他们利益的损害。中右翼政党虽然主张普通民众的福祉应该得到保护,但认为这应该交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来完成,福利不应当被理解为国家的救济,随

^① 转引自姬文刚:《欧盟对中东欧政党政治的塑造作用评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5期。

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普通民众的福祉自然会得到提高。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型,中东欧大部分国家并没有快速建立西式福利国家,尤其是加入欧盟后,各国民众的失落感更加强烈。为吸引选民,中右翼政党开始改变在选民心目中的“冷酷”形象,更加关注选民关心的发展经济、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社会福利等问题,提出要建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正的中右特色的社会。相比中右翼政党而言,中左翼政党更为被动。在资本全球流动的背景下,中左翼政党为推动经济发展,从西方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获得转型资金,吸引西欧跨国资本投资,不得不接受新自由主义者制定的游戏规则,推行与中右翼政党相似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控制等政策。然而,由于与西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中东欧中左翼政党保护劳动阶层利益、建设福利社会的口号似乎更为苍白无力。

出于适应社会结构变迁和选举政治的要求,中左翼、中右翼政党努力超越左和右、从纲领组织型政党向选举型全民党转变的做法,在争取中间选民的同时,却很难兼顾传统选民的利益,于是为其他类型的政党提供了生存空间。一方面,表现为政党体系的碎片化和单一议题政党的出现,如少数民族党、退休者党、绿党等,但它们在中东欧政坛上影响都不大;另一方面,表现为全方位型的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中左翼、中右翼政党趋同更大程度上导致了部分民众对传统政党的不信任。中左翼、中右翼政党如今都被认为是转型的既得利益者。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塞勒尼(Ivan Szentenyi)等学者对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社会分层的研究也支持了这种看法。“在这些国家里新掌权者中只有不到1/5的人在1988年时并非精英。领导岗位上的新贵们的真实来源是原来的中层管理者;也就是说,新‘老板们’是那些在1988年时就已有点权势的人。”^①因此,部分民众“喜新厌旧”,寄希望于一个“超越左右”的新型政党来改变现状。正如乔治敦大学的穆德(Cas Mudde)所言,后共产主义社会更加倾向于民粹主义,因为民众在共产主义时代已经形成并且习惯于浓厚的反政治、反精英的感觉。^②

① [美]伊万·塞勒尼等:《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吕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47页。

② Andrei Țăranu, “Populism as the ‘Democratic Malaise’,” *Europe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heology*, Vol.8, Supplement 1, 2012, p. 134.

(四) 新媒体对信息传播模式和政治动员模式的改变

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带来了新的传播模式和政治动员模式。在传统媒体时代只有少数人能够成为传播者,多数人没有财力或专业知识;在新媒体时代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变得模糊,任何人都可以在新媒体上发布或转发信息,精英阶层的信息垄断优势丧失了,甚至普通民众由于数量上占优势反而在新媒体上获得了比精英阶层更大的影响力,而且新媒体让人与人的联系更为方便,民众不再是“麻袋里的马铃薯”了。

此外,新媒体还导致政治语言简单化与二元化。新媒体缺少传统媒体具有的“把关人”角色,人们可以通过新媒体自由地发布信息,因而信息数量极为巨大,质量良莠不齐,大量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内容和虚假的信息充斥其中。但是,新媒体也具有“过滤”功能。在新媒体上,大多数人更喜欢接受直接、明了、简单、可视的信息,而对需要深思熟虑的内容则会选择性地跳过;信息发布者为了让发布的信息受到关注,也会选择发布虚假的、极端的、挑战社会底线的内容。因此,在关注政治问题时,人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上花三五分钟就能看完的简短文章,或者在社交媒体上与意见不一致的其他网民进行唇枪舌剑,而不愿意花时间去阅读学术著作或者揣摩政策背后的政治规则与经济规律。可以说,新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极端主义的温床,会导致社会共识的降低和宽容精神的衰落。持极端观点的人可以在新媒体上频繁地沟通,强化他们的认同和自信,在匿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从而出现了“群体极化”的现象。^①

由于上述原因,新媒体上“政治正确”标准的影响力今非昔比。这恰恰有利于新民粹主义的宣传,因为新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就是强调通过剥削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来满足人民的相对剥夺感,其本身就是政治不正确的。政治不正确的观点在人与人面对面时也许难以启齿,但在互联网上经过适当包装便能获得大量支持。正如英国 DEMOS 社会媒体研究中心主任巴特勒特(Jamie Bartlett)所言:“民粹主义简短而尖刻的信息在网络媒介中传播效果非常好。”^②相关调查研究也表明,新民粹主义的言论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容易吸

^① 新媒体容易产生群体极化,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是传播媒体则产生“沉默的螺旋”现象,参见〔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 Jamie Bartlett, “Populism, Social Media and Democratic Strain,” in G. Lodge and G. Gottfried, eds., *Democracy in Britain: Essays in Honour of James Cornford*,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2014, p. 94.

引到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失业者和中低收入者。^①

鉴于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及其重要性日益增强,中东欧的新民粹主义者在传播与选举策略中越来越注重使用新的传播渠道,脸书、推特、网络日志、维基百科等在新民粹主义的政治传播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新民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取向,即通过社交媒体来诠释人民,认为它代表了在全部或者接近全部的人。”^②

三、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

在中东欧政治转型的过程中,新民粹主义政党正在影响中东欧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然而,新民粹主义并不能解决中东欧国家面临的问题,甚至在激化矛盾、加深危机。

(一) 新民粹主义的政策难解经济困局

中东欧国家经济严重依赖于外国资本是由它们的转型前提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对内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中东欧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几乎停滞甚至出现了倒退。^③同时,由于在经互会相对封闭的市场中,中东欧各国的产品远离世界市场,缺乏与世界先进产品的竞争力。为缓解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中东欧各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向西方国家举借外债。据统计,中东欧国家每年要用国民生产总值的5%—8%来偿还债务,这不仅严重地削弱了它们的投资能力,而且不得不靠借新债来偿还旧债。^④在此背景下,中东欧国家要启动经济转型,利用外国资本尤其是来自西欧的资本成为

① Jamie Bartlett, et al., *The New Face of Digital Populism*, pp. 18-41.

② Paolo Gerbaudo, “Populism 2.0: Social Media Activism, the Generic Internet User and Interactive Direct Democracy,” in Doniel Trottier and Christian Fuchs, eds., *Social Media, Politics and the States: Protests, Revolutions, Riots, Crime and Policing in the Age of Facebook, Twitter and YouTube*,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68.

③ Simon Commander and Fabrizio Coricelli, “Price-Wage Dynamics and Inflation in Socialist Economies: Empirical Models for Hungary and Poland,”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6, 1992, pp. 33-53; Jacob A. Frenkel and Mark P. Taylor, “Money Demand and Inflation in Yugoslavia 1980—1989,”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Vol.15, No.3, 1993, pp. 455-481.

④ OECD, “East-West Financial Relation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Medium-Term Prospects,” *Financial Market Trends*, Issue 39, 1988, p. 24.

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转型过程中，中东欧国家普遍走上了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的发展道路。外资银行的进入虽然为中东欧各国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信贷资金，同时，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出现了“过度银行化”。2007—2008年，中东欧国家“银行部门总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均超过70%，其中斯洛文尼亚在2008年高达127.9%。“银行部门总存款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大多接近或者超过50%。目前，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银行部门为外资所控制，外资银行所占比重也均超过了50%，众多投资者中意大利、奥地利、瑞典和比利时的银行影响力最大，拥有中东欧国家银行份额的80%。^①

如今，新民粹主义政党拿外国资本“开刀”的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中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并没有建立起独立的经济体系，产业结构上严重依附于西欧发达国家。对于匈牙利欧尔班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指出：“国家合理的干预和规范可以及时遏制失控的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失败。然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国家是为公众的利益服务，政府能够专业地、公正公平地进行干预。然而，如果被无能且腐败的人掌握了这样的权力，匈牙利当前只是‘转了弯(half-turn)’的经济局面就会变成一种倒退(U-turn)”，“任何试图将欧尔班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左’或‘右’的分类尝试都是偏题的”。^②

新民粹主义政党向低收入者倾斜的再分配计划也被认为是哗众取宠和不可持续的。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曼(Catherine Mann)针对波兰的减税和“家庭500+”政策指出：“减税和家庭500+计划将会各增加国内生产总值1%的预算支出，却只能增加国内生产总值0.5%的额外税收，这意味着波兰将增加国内生产总值1.5%的预算赤字，从而让波兰在2016年难以维持在财政赤字低于国内生产总值3%的欧盟标准。”^③如果波兰的财政赤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将面临欧盟国内生产总值0.2%的罚款。为落实再分配政策，而又免遭欧盟惩罚，波兰政府可采取的方案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但可供波兰政府调

^① 刘军梅、张衡：《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视角下的中东欧银行业危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② János Kornai, “Shifting Away from Democracy: Hungary’s U-Turn,” *Public Finance and Management*, Vol.15, No.3. 2015. pp. 171-202.

^③ Henry Foy and Zosia Wasik, “Cost of Poland’s New Child Benefit Alarms Economists,” *Financial Times*, Feb. 21, 2016.

用的财政资源有多少是个问号。因此,波兰极可能因为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过度扩张,拖垮多年来优良的经济增长表现,陷入衰退。

(二) 加剧了政局混乱与政党对立

自剧变至2005年前后新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中东欧国家基本确立了以多党竞争为基础的政党政治:左、中左、中右、右并存的政党格局基本形成,中左、中右开始轮流交替执政。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政党,其竞选纲领中的感情化色彩尤其是反共色彩已大大淡化,而突出自身的执政业绩和未来的执政理念。政党关系由紧张到缓和,各党认识到,多党政治的规则就是各党轮流交替执政,因而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选举结果,而不是暴力或非暴力的不合作。

然而,新民粹主义政党通过鼓吹人民和精英的对立,模糊了先前的政治边界,再次导致中东欧政局的左右分野不再明朗。在匈牙利,青民盟的一党独大压缩了政治光谱左侧的空间,在2010年议会选举后社会党边缘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在波兰,民主左翼联盟迅速衰落,其政治空间迅速被法律与公正党挤占,政党间的竞争主要在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之间展开。在捷克,社民党尽管在2013年议会选举后领衔组阁,但联合政府是“鱼龙混杂”,既有中左翼的社民党、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还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阿诺运动”。在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与民主基督教联盟-民主党依旧轮流执政,但方向-社会民主党的新民粹主义倾向却引发观察家的担忧。在2016年3月议会选举后,方向-社会民主党与民族党、桥党、网络党组成四党联合政府。其中,民族党是极右翼政党,桥党和网络党则是中右翼政党。在罗马尼亚,为应对民主自由党的兴起,社会民主党和国家自由党两个历史上水火不容的党在2008年曾尝试开展合作;此后,为了战胜社会民主党,国家自由党与民主自由党又进行合并。可以说,与转型初期清一色的中左翼或者中右翼政府相比较,如今中东欧政坛传统的左右翼平衡已经被打破,主流政党的凝聚力在下降,实际上“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与主流政党的‘失意’基本是同步的”。^①

与此同时,政党关系也重新变得紧张起来,执政党与在野党间矛盾不断,弹劾总统、解散议会、提前大选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

^① 张健:《当前欧洲极右势力抬头述评》,《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0期。

民党执政期间一直饱受 2013 年议会选举舞弊事件^①的指控和困扰。“欧洲议会观察团负责人格劳斯说,‘我们都为公民和机构间的异化而震惊,……保加利亚人民对于选举程序和国家机构已经信心全无’。”^②但是,欧盟的警告并没有给保加利亚带来稳定的政党格局,借公民游行示威迫使欧洲发展公民党下台的社会党在执政仅仅一年多后,不得不再次将权力交还给欧洲发展公民党,后者迫使社会党下台的方式同样是利用公民游行示威。可以说,保加利亚的政党关系出现剧变以来最紧张的局面。

主体民族政党与少数民族政党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剧变后,中东欧大多数国家通过特殊政策支持少数民族政党的发展。例如,在波兰、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的议会当中均为少数民族政党留有一定席位。由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采取的选举制度是比例选举制,每个政党进入议会的当选门槛是 4%—7%,中东欧大多数少数民族政党常常无法超越当选门槛而被阻挡在议会外。为防止这种情况,一些中东欧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特殊照顾政策,往往会为少数民族政党预留席位。^③在政府组阁过程中,传统的中左、中右翼政党上台后,往往也故意吸收少数民族政党进入政府。如今,新民粹主义政党将少数民族塑造成“他者”的形象,强调他们分得了本属于主体民族的福利,并刻意把少数民族党排除在组阁联盟之外。

(三) 推行一些偏离原有民主化轨道的政策

在转型过程中,中东欧国家都按照西方民主模式来改造本国的政治生态,立法、司法、行政和政党体制等大都按照欧盟的标准进行改革。然而,新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后却推行了一系列挑战旧有政治规则和底线的政策。

青民盟凭借议会 2/3 的多数选票通过立法的形式对经济、司法、银行、媒体加紧控制。匈牙利不仅完成了 1989 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修宪,而且颁布多达 850 项新法律,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到的《新媒体法》。欧盟认为,《新媒体法》触犯了《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中的言论自由原则。在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在 2006

^① 在 2013 年 5 月的选举前夕,保加利亚检察官在一家打印店发现 35 万张非法选票,后经证实这家打印店的老板与欧洲发展公民党存在密切联系。随后,检察官以非法窃听罪起诉了欧洲发展公民党的竞选经理和一名前内政部长。

^② “An Unhappy Election and an Inconclusive Result,” <http://www.economist.com/news/europe/21578116-and-inconclusive-result-unhappy-election>, 2016-05-18.

^③ 杨友孙:《中东欧国家促进少数民族“社会融入”政策及评估》,《俄罗斯学刊》2013 年第 4 期。

年推出了一项重大的公务员改革,允许新政府大幅调整前任政府的人事体系,破坏了文官制度的相对独立性。紧接着,法律与公正党又提议并通过了一项新的《清查法》,试图剥夺波兰前团结工会领导人、社会主义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盖莱梅克(Bronisław Geremek)的欧洲议员资格,直接导致了2007年初波兰和欧盟间的公开对立。法律与公正党在第二次执政时期通过的《宪法法院法》修正案和《媒体法》也饱受欧盟的指责,部分欧盟成员国要求启动对波兰的法治国家审查。

此外,新民粹主义政党还突出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并且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上升为法律意志,干预个人信仰的自由。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以罗马天主教和国家道德的捍卫者而引以为自豪”,^①家庭联盟则视“恢复融国家、民族和宗教为一体波兰天主教民族主义为己任……捍卫‘波兰的天主教’”。^②保加利亚的“阿塔卡”联盟主张将东正教定为国教,认为国家与宗教在所有公共事务上应完全配合。斯洛伐克的民族党将基督教的道德准则贯彻于社会政策之中,认为历史上的政教分离原则在法律上是荒谬的。^③真正付诸实践的则是匈牙利的青民盟。青民盟政府上台伊始就提出了一系列保卫基督教价值观和家庭价值观的口号,把基督教作为匈牙利的历史和文化的基礎。新宪法序言中的第一段就明确提出“上帝保佑匈牙利”的宗教言论,将匈牙利的身份认同置于基督教欧洲当中,将宗教信仰视为民族团结最基本的手段。在宗教贯穿于政治的同时,政治干预宗教的事例也频频出现。国家不再支持自由创办教会,甚至建立了所谓的“宗教计划组织”对教会进行直接的管控。仅在2012年,就有超过300个教会团体被政府取缔。

(四) 恶化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的关系

加入欧盟曾是中东欧国家剧变后的首要战略目标。实际上,对它们来说,密切与欧盟国家的关系、加入欧盟并不单纯是一种外交行为或者经济行为,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一种试图重新与欧洲主流对接起来的价值取向。在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过程中,欧盟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

^① Jakub Dymek, “Poland’s Rightward Turn,” *Dissent*, Vol.63, No.2, 2016, p. 121.

^② Ben Stanley, “Confrontation by Default and Confrontation by Design: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Poland’s Populist Coalition Government,” *Democratization*, Vol.23, No.2, 2016, p. 265.

^③ Andrea L. P. Pirro,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Different Context and Issues of the Prophets of the Patria,” p. 612.

引导和规范作用。通过入盟标准的制定及据此开展的各项评估,欧盟成功地促使中东欧国家走向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①

然而,加入欧盟后,中东欧国家“离经叛道”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对欧盟设置的标准,中东欧政党根据选举的需要会做出较大调整,“阳奉阴违”的现象也时有发生。^② 欧盟的约束力似乎在逐渐减弱。以匈牙利为例,2012年1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三项针对匈牙利的法律程序,分别涉及匈牙利中央银行独立性、法官退休年龄和国家数据保护局独立性问题。对此,欧尔班表示:匈牙利拒绝被欧盟当作“二等公民”对待,匈牙利会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需要别人的指引和不请自来的帮助。随之,匈牙利政府与欧盟在对待公共债务、预算赤字、央行改革等方面口水仗不断。前者抱怨后者在欧洲金融危机中对其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而后者指责前者破坏了欧盟课税法律、损害央行独立性。针对欧盟的批评,欧尔班的回应是财政独立是自由的条件,独立的中央银行并非指其独立于国家,而是指它能够保护国家经济免遭外国利益的侵犯。上述分歧导致了匈牙利与欧盟关系持续紧张。^③

总之,新民粹主义只是提出问题,却不能解决问题。新民粹主义政党势力的抬升不仅反映了中东欧国家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用来重新衡量各国转型的效果。正如有学者指出,“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看作是反民主的胜利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它是20世纪90年代漫长的民主化进程的产物”。^④

目前,新民粹主义政党无论是台上的青民盟、法律与公正党、方向—社会民主党,还是在野的欧洲发展公民党和民主自由党,或是其他未曾执政过的新民粹主义政党都有其群众基础。可以看到,某个新民粹主义政党的迅速衰落,但是,其他的新民粹主义政党会迅速占领它的位置。但由于新民粹主义政党带有迷惑性的允诺难以兑现,民众失去“精神鸦片”之后,该何去何从?是重新

^① John Ishiyama, “Europeanization and 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in Post-Communist Politics,” *Politics & Policy*, Vol.34, No.1, 2006, p. 5.

^② Sertan Akbaba, “A Critical Assessment of a Eurosceptic Party Group on European Integr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 Group,” *Baltic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4, No.1, 2014, pp. 100-101.

^③ 《欧尔班要求欧盟“平等对待”匈牙利》,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3/16/c_111663238.htm, 2012-03-16。

^④ Ivan Krastev, “The Populist Moment,”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07-09-18-krastev-en.html>, 2007-09-18.

回归传统政党,还是变得更为激进?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来看,大部分民众并不会因为新民粹主义政党的“空头支票”难以兑现而变得更加理性,放弃对它们的支持,因为法律与公正党、欧洲发展公民党、民主自由党都已几经沉浮。

更值得注意的是,新民粹主义政党在野后为卷土重来在政策主张上会变得更为激进。短期内,新民粹主义政党虽然野心勃勃,但不会摧毁中东欧国家现行的政治体制。在过去20多年里,中东欧国家彻底告别了苏联模式,建立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实现了权力的分离与制衡。大部分尤其是影响大的新民粹主义政党都是在现有宪政框架下活动的。它们并没有公开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是利用了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然而,不断激进的新民粹主义政党最终会把中东欧国家引向何方,目前还很难定论。

现今,中东欧国家已经出现反思和反对新民粹主义的声音。匈牙利“出现了一些新趋势,表明青民盟强硬的民粹主义体制开始从‘内部破裂’,因为青民盟在政治胜利后推行了一系列可以导致现有体制瓦解的失败政策”。^①针对青民盟的政策,一些年轻人提出了“我们是民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但是我们不想成为最后一代”的口号。然而,当今中东欧国家还没有政治力量找到治疗社会病急的“良方”,还缺少一个与新民粹主义抗衡的新话语体系。“民主政党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造就一个新的、供人民反对民粹主义毒药的政选,因而,而民主政党的‘政党真空’仍将持续。”^②新民粹主义既然不是一个美好的选择,取而代之又将是什么呢?

^① Oliveér Kovaács, “The Hungarian Agony over Eurozone Accession,” in José Magone, et al., eds., *Core-periphery Relat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332.

^② Attila Ágh, “Decline of Democracy and Increasing Populism in East-Central Europe: Populist Democracy as Electoral Autocracy in Hungary,” p. 14.